

# 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

□ 徐秀军

光明论坛  
中国新闻奖专栏

评论版投稿邮箱  
gmpinglun@163.com

当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出现、相互交织,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在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是唯一正确选择。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日晚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所指出的:“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

多边主义赤字加大全球性挑战。近年来,部分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逆流横行,多边主义赤字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难以凝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识和合力。在世界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时,有些国家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和危机,热衷于病毒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对外推行各种形式的“脱钩”,经济全球化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经贸领域,有些国家为

自身短期利益不惜破坏全球多边规则体系,热衷于采取单边行动频频对外挑起贸易摩擦,采取过激的安全审查措施给跨境资本流动设置障碍,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干扰。在发展领域,有些国家不仅逃避自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还肆意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合法权益,阻碍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在单边主义受到直接冲击的同时,多边主义的隐性赤字问题更值得警惕。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危害,多边主义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明目张胆地推行单边主义难度加大,有些国家开始转向借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根据自身偏好和需要拼凑排他性的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这种有名无实的多边主义更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值得国际社会加以防范。它不仅直接导致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力量分化,还增加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内耗。正因如此,各种全球性挑战不仅得不到根本解决和有效缓解,还不断升级和扩大,并给人类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守正出新中弘扬多边主义。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已成为国际社会

的基本共识。让多边主义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利器,既要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也要推动多边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要坚持国际法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要坚持协商一致,不搞冲突对抗;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具体来说,弘扬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维护好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时,也要看到现有多边体系的问题与弊端,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多边主义守正出新贡献了新思路和新方案。首先,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而产生的安危与共、荣辱相依、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总体意识。其次,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秉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多边主义守正出新提供了重要实践平台。最后,中国积极

推动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断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以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能坐而论道,而是重在行动和实效。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经验教训表明,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唯有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大国尤其要为推进多边合作做出表率,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发挥在国际抗疫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做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更多内容请扫码  
关注“学习短评”专栏

## 光明时评

中国新闻奖专栏

“想毁掉一个农村娃,就给一部手机。”近日,媒体刊发的有关农村儿童沉迷手机的报道引发关注。有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0.3%,其中93.4%的农村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作为上网设备。手机,已经成为农村儿童和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媒介,也是人们观察中国农村青少年生活图景的一个窗口。

学生手机使用成瘾和无度,是当前农村学校在教育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短视频平台已然植入农村青少年生活圈,一些女孩子借此学会化妆和打扮,一些男孩子则难以抵挡网游诱惑。为使用手机,学生与老师斗智斗勇,上演各种“猫和老鼠”的游戏。对此,一些学校引进能够探测出手机的仪器,并将其放置于校门口处,但学生总能想出各种办法带手机入校,放鞋底、放内衣里,买模型机充数,甚至花钱放在学校的小卖部里。

农村学生为何如此爱玩手机,如此离不开手机,这固然因为手机承载了现代生活太多的功能,然而这显然不是城镇学生和农村学生在“手机大作战”中表现不同的关键。毋庸讳言,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异,一个体现就是父母、教师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的能力。城市里的孩子同样面临严重的手机使用无度问题,不过相对而言,有父母和学校更精细的引导,合理使用手机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置身互联网时代,人们时常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世界是平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触及全世界。但显然,网络世界依然有诸多无形的障碍和边界,与现实世界相互映衬。尽管城市和乡村的孩子都在使用手机,但他们所接触到的网络内容是不一样的,对成长的影响也不同。农村孩子的父母或外出打工,或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鲜有闲暇,无法做到时常陪伴,更不要奢谈高质量陪伴,也无法或无力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笔者在田野

调查中发现,农村的孩子常用一种很本性的方式使用手机,他们更依赖手机去接触外部纷繁复杂的世界,缓解自己内心的情感缺失和学业上的困顿,也更容易受到不良内容的诱惑。

面对学生手机沉迷,出于升学等考量,不少学校选择手机禁入校园这一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但由此可能衍生的问题也不可不容。比如校园内完全拒斥手机,短期内造成农村孩子放假后报复性无度使用手机,长此以往或拉大他们与城市里的孩子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的差距。笔者认为,如果说让农村孩子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完全隔离于手机和各种新媒体之外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这恰恰说明,当前我们似乎依然需要为这个群体提供一种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模式。目前来看,这种教育教学模式常常与严格的管理和密集的时间控制相连,更具人文关怀和教育智慧的可能空间还需挖掘。

关于农村学生手机使用问题,我们更要追问的是,除了手机,他们还能玩什么?他们的闲暇时间是否还有其它选择来填补?是谁以何种方式在陪伴他们成长?他们的心理和情感需要能否被满足?至于成长的困扰和青春期的迷茫,又是否有人能够及时发现并引导?在某种意义上,手机使用问题不过是症候,背后实则缠绕的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乡村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文化资源匮乏等诸多现实问题。

就眼下而言,需要正视手机沉迷对农村儿童群体学业的影响和挑战。在控制手机使用的过程中,老师或家长有必要和孩子进行理性的沟通协商,一起来制定使用手机的规则,教会孩子合理有益地使用手机。这个理性共商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任建设的过程,这将帮助他们自己信任自己,而不是被动地承受以手机为载体的新媒体和互联网不好一面。

农村儿童作为使用手机的主体,同样有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单纯地将他们视为“被管理者”,在恰当的引导下,还要相信他们有能力合理使用媒介。这呼唤农村学校和教师

以更人性化、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就以手机为载体的各种媒介,就可成为学习的渠道,并带来更多成长的可能性。(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 别让手机成为农村儿童唯一一扇窗

□ 程猛

# 套路作文怎样“解套”

□ 唐晓敏

## 文化评析

当代语文教学中,作文是一个难题。近日,有媒体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应试作文和好文章长期存在着冲突”,再次引发讨论。

然而,在传统语文教学中,作文这个难题似乎并不存在。那时,写作文是很简单的事,简单得让人惊讶。古代的许多孩子七八岁就能作文,有的甚至更早。陆定一就说过:“我查了一本书《唐说荟》,知道一千多年前唐代有不少孩子,‘六岁能文’。”文史学家傅庚生也曾说:“在清末民初,五六岁的孩子,到十岁左右,资质不太差的,就可以写文言短篇,大致通顺。”

既然如此,如今的学校语文教育中,作文何以成为一个难题呢?说起来有些复杂。笔者认为,主要是现代学校的作文教学没有继承传统语文教育的读写经验,更具体说,没有把课文作为学生学习写作的“参照对象”。这并

不是说,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多年来,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一直要求“文质兼美”,尽管不能说所选的文章都非常优秀,但大部分文章还是“好文章”。关于“好文章”,美学家叶朗有个说法,认为其特点是“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趣味”。照此,语文课文的大部分文章能达到这个标准,至少也是接近这个标准的。好好学习这些文章,揣摩这些文章的写法,汲取这些文章的写作经验,学生作文就不会那么难。

问题是,多年来,语文教学一直没有紧紧抓住文章来教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这些课文,语文教学主要是分析其中心思想,找出中心思想才是重要的,文章整体的美质、文章的形象生动及所包含的深湛的写作技巧,都没能给学生留下多少印象。这很像吃苹果时只想着得到苹果的果核,而没有吃到果肉,因此也就未能吸收苹果的营养。

本世纪初的语文课改,提倡语文教育的现代化教学方式和讨论方式,有一些语文课成了“才艺展示课”“影视欣赏课”“主持人比赛课”“口头辩论大赛课”等,课堂热热闹闹,但恰好忽视了最重要的学习,即熟悉文本,有些课堂上学生甚至不能把课文流畅读下来。

之后,上述情况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语文形式的训练得到重视,却又把课文当成语文学习的“载体”,认为课文的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它所承载的语文知识,乃至提出“内容与形式说”再讲。

总之,由于忽视课文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忽视课文在学生写作能力培养方面的重要价值,学生写作的作文无法借鉴课文,就只能直接借鉴高考的范文,并进一步研究总结这些范文的写作经验,最终形成一些固定的套路。套路作文被大量采用,使这种作文的“效能”不断降低,难以获得理想的分数,另一方面也使人怀疑作文在选拔人才方面

的信心。

“解套”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是语文教学要以课文的学习为中心,重视课文的解读,让这些“文质兼美”的文章刻印在学生的心田,成为学生作文的“范本”。如果语文教学不能真正重视课文的整体感受,而只是如教育研究者温儒敏所批评的“美文鉴赏变成冷冰冰的技术分析,甚至是考试技巧应对;学习古文,则一个字一个字嚼碎了讲,课文还没读出感觉,就要总结思想、分析形象”,那么套路作文就始终难以终结。

二是需要提升语文试卷的评阅水准,尽可能准确地评判出套路作文,使套路作文得不到高分。有必要指出的是,中高考的作文题应尽量联系学生的阅读实际,包括课文学习的实际和课外阅读的实际,让其真正发挥引领阅读的作用,结束教学对文本的轻视。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

# “特斯拉维权”背后是数据法治化命题

□ 吴沈括

特斯拉女车主在上海车展维权的事件在网络世界不断发酵,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公共议题。事关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在大众追问的情绪因素以外,我们更需要理性地检视特斯拉事件折射的诸多数据治理问题。

从事主方和公司方的多轮公开发声,到各级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保护组织的多次立场表达,不难观察到,虽然话语角度存在差异,但都涉及一个共同的关切,那就是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诸多场景在内在的数据流转利用,应该依据何种法规的问题。更进一步而言,车主作为数据主体对于其自身车辆的车主数据和行车数据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特斯拉等车企在各项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提供以及披露等各个环节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正是务实探讨现行法律法规与未来生态完善的钥匙。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度重视数据主体的权益保护,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的决定》,到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从刑法到民法典,现行法律法规都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满足用户围绕其数据的安全可信利益。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数据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重要数据,损害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系统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得通过网络非法控制和操纵用户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系统的控制

权;此外,保障用户的选择权,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应利用用户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损害用户的数据安全和利益。

而在今年4月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二次审议的数据安全法草案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更是以明确的规范设计再次强调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数据主体对数据尤其是其个人数据在流转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充分控制权益。由此意味着在国家法律层面,用户个人(如车主)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依据何种法规的问题。更进一步而言,车主作为数据主体对于其自身车辆的车主数据和行车数据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特斯拉等车企在各项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提供以及披露等各个环节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正是务实探讨现行法律法规与未来生态完善的钥匙。

这一系列关于数据的法定权利为我们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也即,当车主有权要求车企提供其个人数据的复本,也有权要求车企明确解释对其个人数据的处理方式和业务规则。在数据流转利用的过程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扮演着重要的生态角色,他们担负义务的实现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数字生态的法治水平。目前各界从业单位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全面建设数据合规风控体系,自觉以实际行动遵从法律法规要求,满足民众的各项数据权益诉求,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设与品牌形象。事实上,在当下实践层面,企业等各类主体

依法根据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做出同意,开展数据采集、处理以及披露等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的业务共识。而除非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企业等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公开披露处理的个人信息,更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的明文要求。

这一揽子关于数据的法定义务为我们回应上述第二个问题提供了清晰的依据。在特斯拉维权事件中,由于相关行车数据构成当事车主的个人信息,因此在对外披露的过程中,应当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

就在5月12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汽车数据安全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就收集个人信息应取得被收集人同意等事关车主和车企所对应的权利与义务两大问题做出了规定。我们相信,随着国家持续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与数据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侵害各类数据权益的行为,加强数据治理和数字素养的宣传教育,民众持续提升自身数据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各方企业主动落实数据处理义务,基于数据流转利用法律规则的数字生态必将成为可期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



更多视频评论  
请扫描二维码

# 我们需要正确的教育“绩效观”

□ 艾萍娟

## 新闻随笔

孩子的好坏用分数来衡量,老师优秀与否用孩子的成绩来衡量,学校的优劣用升学率来衡量……基础教育领域似乎正在“KPI化”。KPI(关键绩效指标)是企业常用的一套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其最大特点是能量化、能考核。在这种趋势下,家长成了培训机构营销的对象,孩子成了产品,教学过程成了简单粗暴的“灌输+刷题”,一切都为了迅速拿到高分。

所谓的教育“KPI化”,其实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其本质就是久违话语的“唯分数”“唯升学”论。而要扭转教育“KPI化”的倾向与趋势,需要全社会有新的教育“绩效观”。

对于一地来说,怎样的基础教育才算好的基础教育?看此地是否有名校,到现在还被认为“主流观念”,而评价名校的指标无非是升学情况。单从学校角度看,那些“升学名校”似乎确实是“名校”,如若把打造“升学名校”作为地方教育部门的政绩,那么势必会导致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集中。而这显然不利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以及健康教育生态的构建。现实中,在“超级高中”的带动下,升学竞争加剧,义务教育阶段也出现变相的重点校、示范校。

换言之,如果一地有升学表现特别突出的学校,那么或可说明当地教育部门在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履责中存在问题。因为在按就近免试入学原则招生的义务教育阶段,以及严格在规定区域招生、

不进行提前招生、超大规模招生的高中教育阶段,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一校独强的“超级学校”。然而,现实是,“升学名校”被作为地方教育部门展现教育政绩的材,并在此方向上锲而不舍。

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如何办学,提供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当前,一些教育部门选择用学生考试分数、升学情况来评价教师“绩效”。如此绩效考核下,教师不愿把学生分为“优生”“差生”,由于“差生”无法对升学作出贡献,难免会被边缘化,更有甚者,要求部分成绩较差的初三学生提前分流到中职学习,以此提高高中的普高录取率。如此绩效考核,还导致我国的基础教育“名师”大多出自“升学名校”,而那些弱校和中职学校教师,由于生源问题也难获社会关注及认可。

企业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而对员工设有绩效考核,无可非议。但上述的教育“绩效观”,无疑是与育人初衷相背离的。以学生分数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甚至唯一指标,于教师来说,很难实践而向所有学生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对学生来说,在这套体系下,很有可能被打成学习的机器。去年,国家层面对教育评价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明确要求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各地有关部门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摆脱对集中力量办名校、下达升学指标等教育发展路径的依赖。与此同时,要加快构建面向所有学生的全新教育评价体系。毕竟,发展教育,是为了给所有学生提供完整的教育过程,而非追求功利的绩效。

(作者系教育研究者)